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系列

主 编 瞿林东
副主编 易 宁

——
外国史学研究

史学理论的世界视野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K091/5

2007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系列

主 编 瞿林东
副主编 易 宁

——
外国史学研究

史学理论的世界视野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学理论的世界视野: 外国史学研究/瞿林东主编.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7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系列)
ISBN 978-7-303-08686-3

I. 史… II. 瞿… III. 史学 - 研究 - 外国 IV. K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0735 号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 bnup. com. cn](http://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55 mm × 236 mm
印 张: 22. 5
字 数: 338 千字
印 数: 1 ~ 2 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 00 元

责任编辑: 李雪洁 装帧设计: 孙 琳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董本刚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 - 58800697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出版部电话: 010 - 58800825

总 序

2000年11月，在20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被教育部评定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不仅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国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同仁的一件大事，因为这个重点研究基地是全国这方面研究者的共同“平台”。

六年多来，在校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在教育部社科司的指导下，我们凭借这个“平台”，在学术研究方面做了一些事情，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而深感这个“平台”设置的必要性及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六年多来，我们这个研究中心向全国同仁提出了12个重大研究课题进行招标，得到了热情的响应，使这些重大研究课题都一一有所归属。这些研究课题是：

- (1) 中西古代历史、史学及理论比较研究
- (2)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
- (3)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研究
- (4) 中国近代史学思潮研究
- (5) 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研究
- (6) 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中西史学比较研究
- (7)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
- (8) 20世纪西方史学主要思潮及相互关系研究
- (9)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研究
- (10)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
- (11) 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研究
- (12) 环境史研究与20世纪中国史学

我们设计这些重大研究课题的宗旨是：第一，有益于促进学科建设；



第二，有益于推动历史学的发展；第三，有益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目前，这些课题有的已经结项，有的近于完成，有的正着手研究。

基于上述宗旨，我们还多次主办了全国性和国际性的研讨会，它们的主题分别是：

- (1) 唯物史观与 21 世纪中国史学 (2001, 北京)
- (2) 新中国史学的成就与未来 (2002, 北京)
- (3) 20 世纪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 (2003, 北京)
- (4) 史学遗产与民族精神 (2004, 温州)
- (5) 理论与方法：历史比较和史学比较 (2005, 芜湖)
- (6) 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 (2006, 扬州)

这些主题，吸引了国内外同仁的关注，使每一次研讨会都取得了很大的收获，既广泛地沟通了学术交流，又促进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推动大家作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在这方面，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感受良多。我们以及与我们共同主办研讨会的兄弟单位的同仁，更是深受教育和鼓舞。

六年多来，我们这个研究中心的专、兼职研究人员，围绕着所参与的重大研究课题和有关学术会议并结合自己的专长，撰写和发表了近千篇论文，有不少论文是作者多年思考的结晶，有突出的创见和较高的学术价值，而大部分论文的作者都能提出独到的见解。可以认为，这些研究论文，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视角，或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其研究所得都对促进本学科发展，丰富本学科内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为了广泛地进行学术交流，也为了适时地积累学术成果，我们选编了部分论文，辑成“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系列”丛书。丛书凡四种，它们是：

- 历史研究的理性抉择——历史学的理论、历史与比较研究
- 文明演进源流的思考——中国古代史学研究
- 历史时代嬗变的记录——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
- 史学理论的世界视野——外国史学研究



我们以这套丛书奉献给国内外同仁，以示诚恳请教之意。同时，我们也衷心期待来自各方面读者的有益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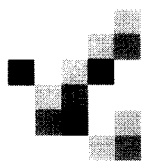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给予有力的支持，责任编辑李雪洁女士为此书的编辑付出辛勤的劳动，提供许多有益的建议，各位作者给予积极的配合，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瞿林东

2007年4月30日撰于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 1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中的几个问题 ■张广智
- 20 历史叙述、历史理解与历史意义 ■韩震
- 34 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 ■于沛
- 53 全球化情境下的思想史写作 ■陈新
- 67 修昔底德的人性说及其历史观 ■易宁 李永明
- 81 略论希腊化史学 ■陈恒
- 101 罗马早期国家论 ■杨共乐
- 110 从“人”的角度看环境史家与年鉴学派的异同 ■梅雪芹
- 119 孚雷法国革命史学述评 ■顾杭
- 140 后现代主义、现代性和史学 ■刘北成
- 144 叙事、虚构与历史：海登·怀特与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型 ■彭刚
- 170 历史比较初论：比较研究的一般逻辑 ■刘家和 陈新
- 183 察同察异求规律：比较史学的追求 ■庞卓恒
- 197 “一”和“多”相济的发展 ■刘家和
- 225 中西古文明比较 ■庞卓恒
- 265 史学理论结构的非平衡发展：西方和古代中国的比较 ■徐浩
- 281 历史比较与西欧封建社会研究：访马克垚教授 ■邹兆辰
- 297 再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 ■张广智
- 310 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回顾 ■朱政惠 李江涛
- 333 20世纪中国的外国史学史研究 ■周文玖



张广智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中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在马克思留给后世宏富的精神遗产中，也包括一份丰厚的史学遗产。正如当代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E. P. 汤普森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最丰富的遗产之一就是历史学”^①。我个人以为，无论是对马克思史学遗产的深入发掘，还是对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认真盘点，都是颇有助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

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试从历史学的角度论述马克思的史学遗产；第二部分就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过程中的若干问题，谈一些个人的看法；第三部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二战”后的发展，侧重阐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取向。拙文旨在为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研究工作作些补白，鉴于这方面学力不逮，祈望识正教正。

—

何谓史学遗产？前辈学者白寿彝多有论述。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连续发表的几篇著名的深入浅出的“答客

^① 见刘为：《有立必有破——访英国著名史学家 E. P. 汤普森》，《史学理论研究》，1992 年第 3 期。

问”，其“真知灼见，在在多有”^①。时贤瞿林东进一步对“史学遗产”下了这样的定义：“所谓史学遗产，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前人在史学活动中的创造和积累，是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② 倘此义可取，本文所说的马克思的史学遗产也是他在史学活动中的创造与积累。不言而喻，马克思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他的名字是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在他的生涯中，也有“史学活动”，也有为此而作出的具体的史学研究工作。

毋庸置疑，马克思留给后世的史学遗产，应当包括他的历史理论，就其基本的和主要的方面而言，这当然指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可以这样认为，由马克思所奠立的唯物史观，是世界史学史上最为科学的历史理论（历史观），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一种科学的归纳与总结。

但倘若我们把马克思的史学遗产仅仅归结为唯物史观，这是不够全面的。在丰富的马克思的史学遗产中，还包括他的史学理论^③。这里所说的“史学理论”，指的是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大体说的是历史认识的主体（主要为历史学家）和历史认识的客体（历史的客观实在性）之间的关系。在当代中国学界，似乎还缺乏从这一视角论述作为历史学家的马克思的卓著业绩与杰出史才^④。

拙文有意在这方面作些补充。作为历史学家的马克思，他一生写下

① 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② 同上书，1页。

③ 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的史学理论研究兴矣。在学术讨论中，史学界人士感到有必要把历史理论（关于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理论问题）与史学理论（关于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相区别，把史学理论单列出来，以获得专门的关注。当然，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是不可截然分开的，它们因各自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有差异，但又互有联系。参见当时发表的较有代表性的两篇文章：陈启能：《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载《光明日报》，1986年12月3日；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④ 即便是国际学术界，也不多见。例如G. A. 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78），涉及的也多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意在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作辩护，而鲜有探讨马克思的史学理论（本书已有中译本，岳长龄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我们在《西方史学史》第七章“近代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一节中，论述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而非狭义的历史学自身发展的理论（史学理论），这也是有待增补的（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版，267~279页）。

了诸多的历史著作或准历史著作，在这里，我只能采取“管窥蠡测”的方式，选择被恩格斯称之为“天才著作”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个案。我以为选择这部著作以了解马克思的史学活动与史学才能，是颇具典型意义的，从中可以知晓马克思是如何运用丰富的材料和已有的知识，去认识与分析事件和人物，可以领略马克思是如何运用历史编纂的才能撰写历史，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教育功能的。

1851年12月2日，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仿效他的伯父（拿破仑第一）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次年1月通过新宪法，规定一切权力都集中在总统手中。1852年12月2日宣布路易·波拿巴为法国皇帝，帝号拿破仑第三。这个事变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好比是“晴天霹雳”，“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①。而马克思则不同。由于他对法国历史了然于胸，对相关史料谙熟有加，更在于他对当前所发生的事变有一种深刻的考察。因此，当一个历史事件尚未结束或即将终结时，马克思就能从总体上考察它的进程，预测它的结局，既不为它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也不为它的迂回曲折所惊愕。这只有天才的历史学家才能做到。在西方史学史上，古希腊时代卓越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具有这样的史才，这种为后人所叹服的才干，他的传世之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确可“垂诸永远”。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确可与修昔底德相比，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马克思这种令后世历史学家叹为观止的才干，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他对活生生的时事”^②有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即时史”（当代史）。当代

① 恩格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写的第二版序言中，曾提到与他同时出现、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有两部著作：一是维克多·雨果著的《小拿破仑》，他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在雨果的笔下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一是蒲鲁东著的《政变》，他对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

②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译为“活生生的时事”（第582页）；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则译为“当前的活的历史”（第601页）。两相比较，似乎1972年版的译法——“活的历史”更为精当确切一些，不过以下译文大体上仍是依据1995年版本，在个别字词句上酌情采用1972年版本的译法。



法国新史学家让·拉库蒂尔在《即时史学》一文中指出，即时史学不是研究“已完成的变化”，而是研究“正在发生的变化”^①的学科，即如恩格斯所说的“活的历史”。马克思适时地将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这个时期发生的事件写成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名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它不仅是一部阐发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经典文献，而且也是马克思通过他的史学研究工作，用法国这一时段的历史研究成果去验证他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史观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表现形态，亦即历史著作的编撰原则与撰史技艺，则关乎实现史学的社会功能与教育功能的和谐统一，这当然也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倘若我们有意从历史著作的角度，重读这部名著，就可发现马克思在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所体现出来的历史学家的禀赋。笔者眼力不健，仅就个人管见，在丰润的马克思史学睿智中，撷取数项，以见一斑。

叙事有条不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共七节，以时间为序，逐一写来。结构详略得当，略处惜墨如金，如对二月革命时期的情况，仅用1页；详处不惜笔墨，如对立宪共和国和立宪国民会议时期的描述，篇幅甚多。尤其是它的开头与结尾更是匠心独具，令人心往神驰。全书以人们现已熟知的黑格尔之论开篇，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马克思紧接着写道：“他（黑格尔）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②这种开篇，出手不凡，紧紧地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这部著作的结语是这样写的：“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③马克思的这一预见，已经实现了。头尾衔接，天衣无缝，行文有序，一气呵成。

叙论结合。马克思在书中的议论，不是孤立的，它们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论断与叙事的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又常有神来之笔，恰到好处。

① 让·拉库蒂尔：《即时史学》，载J. 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22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另，让·拉库蒂尔在列举即时史的作品时，显然提到了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4页。

③ 同上书，688页。



处。诸如“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①“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②“历史真能捉弄人!”^③“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④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⑤等等,现都被反复征引,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名句(段)了。

叙事中的历史比较。由于马克思对西方历史了如指掌,在行文中不时穿插历史的比较,主要是把当前事变与西方古代以来的历史作比较,把近世欧洲历史与罗马古史作比较,把近代法国历史人物与英国历史人物作比较。运用这些历史比较方法,有力地强化了叙事中的历史感,往往可以达到令人难以忘怀的阅读效果。

叙事中的修辞艺术。在这方面,有两点尤其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借助修辞学上的比喻(譬喻)辞格,那真是通篇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尤其是马克思活用古希腊罗马神话,书中像“阿基里斯一样有个致命弱点”^⑥、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⑦、像“鹅的叫声能够拯救卡皮托利诺”^⑧等比喻的运用,举重若轻,信手拈来,令人过目不忘。另一是借助修辞学上的排比辞格,那更是“通篇俯拾皆是”,限于篇幅,这里只引两例,足资说明。例一,为了说明《十二月十日会》这个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秘密团体之混杂,马克思这样写道:“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生计可疑和来历不明的破落放荡者,除了资产阶级中败类和冒险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捡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叫化子,一

①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5页。

② 同上书,585页。

③ 同上书,619页。

④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翻译成“人生观”,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翻译成“世界观”(第629页)。“人生观”、“世界观”这两种译法似乎是依据德文“Weltanschauung”一词而来。虽然单纯从文字上来看,“Weltanschauung”译成“人生观”、“世界观”都是可以的,但是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之中,译成“世界观”似乎更妥当一些。

⑤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611页。

⑥ 同上书,600页。

⑦ 同上书,628页。

⑧ 同上书,589页。

句话，就是被法国人称作浪荡游民的那个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处漂泊的人群。”^①在这句里，除了马克思连用的两个“除了……”介词短句，其后竟连用19个定语以修饰“人群”，这个“群体”之驳杂、之浑浊、之污秽，跃然纸上！例二，马克思还善用由虚词如介词、连词等组合的复句，进行排比，书中不断出现的“不是……而是”、“既不能……又不能”、“由于……”、“于是……”等开首的分句，常常连用五六个以上，这种修辞效果强烈而又痛快，使读者欲罢而不能。

好了，我们不再作烦琐的援引，还是让我们去读一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吧！由此看来，马克思不愧为叙事高手、编撰巧匠、修辞行家、语言大师。简言之，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文体确如当代西方史学史名家伊格尔斯所说的，是一种“漂亮的风格”^②。什么是“漂亮的风格”？伊氏未作论述。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著作，不只是在这里集中举例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还包括他的其他历史著作，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乃至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等，其行文特点（或“风格”），倘仿照与学习马克思运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可否作这样的描述：厚实而不失畅达，庄重而不失幽默，犀利而不失清逸，丰润而不失大气。伊格尔斯在说到马克思文体“漂亮的风格”时，说它的“解释”与“风格”胜过了奥·梯叶里、弗朗索瓦·基佐、路易·勃朗和洛伦茨·冯·斯泰因昔日按照阶级冲突对法国政治的分析。其实何止于此。马克思虽不是一个职业历史学家，但就其个人而言，作为历史学家的他，其史才确可与前述伊格尔斯所说到的几位西方史家相比肩，还可与兰克、蒙森、米涅和巴克尔等19世纪西方一流史家相媲美，遑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了。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历史著作中，他所淋漓尽致发挥的史学才华，完全是为他所要表现的内容服务的。换言之，即是为了更透彻地阐明正在发生的“当前的活的历史”，为了更精确地刻画路易·波拿巴这个政治小丑和“骄横的流氓无产者”^③的形象，技巧与立场相关，手法与情感结合，历史文本的内容与

①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35页。

② 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赵世玲、赵世瑜译，14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③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43页。

形式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有机的统一。“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这是我国史学上用来称赞史家才能的话，可见“叙事”与“良史”是紧密相连的。倘借用这句话来评价马克思的史才，也是适用的，马克思的确“善叙事”，他无愧为“良史之才”的称号。

二

马克思之后^①，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经历了跌宕起伏与坎坷曲折的发展过程。陈述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史，不是本文的任务。在这里，笔者的思绪随历史的纵向推进而凝聚，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的进程中撷拾一二，略陈管见。

其一，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需要辨析与重评。

辨析意味着陈见与新知的变换，重评意味着真理与谬误的识别，辨析与重评是革故鼎新，是学术争鸣与学术研究工作双向回应的提高过程。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也需要如此。我这里略举 19 世纪末、20 世纪最初几年里的一些事例以资说明。^②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马克思逝世之后，主要是它的唯物史观，开始在欧洲各国传播，德国的弗兰茨·梅林，卡尔·考茨基，法国的保尔·拉法格，意大利的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诸家，对此都作出过各自不同的贡献。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角度来看，他们对马克思史学遗产的传承与弘扬，由于众多的历史原因，对我们而言，或不甚了了，或曲解误读。这就需要我们辨

^① 本文所指马克思，往往也包括恩格斯在内，正如时贤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两个人又是一个人。他们各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但又是同一种思想体系的共同创始人，这当然包括恩格斯对创立和捍卫唯物史观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参见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2~3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又，上个世纪中后期，在西方出现了贬低恩格斯的思潮，同时制造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的神话，显然是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参见黄楠森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107 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拙文在这里所说的，是指马克思与恩格斯逝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② 本段所说的“辨析与重评”及下文所要说到的“回顾与总结”、“开掘与深化”，实际上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的各个时段中。这里所分，主要是为了说明题旨，出于写作的需要，但也兼顾到各个时段，或各个地区、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

析，作出新的评价。

例如对考茨基。关于考茨基，列宁的确早有定评，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书中，列宁这样写道：“我们从考茨基的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是懂得怎样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虽然他后来成了叛徒，他的那些著作仍将永远是无产阶级^①的财富。”^②然而，令人疑虑的是，在1914—1916年的战争以前，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考茨基，对于他的《基督教的起源》、《伦理学和唯物史观》、《社会革命》等“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财富”的那些作品，有谁从历史学的角度作出过认真的辨析？考茨基这个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已被“叛徒考茨基”恶名的单面性所掩盖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史学业绩因而也更被“叛徒考茨基”的恶名所掩盖了。对此，难道不需要我们从学科史的视域作出清理并予以重新评价吗？

普列汉诺夫的情况可能要好一些，因为他早年于俄国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贡献卓著。在史学界，也很少有人不知道他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等传世名作。但倘若进一步追问，普列汉诺夫的史学思想是怎样的？他在史学理论上的建树又怎样？这就有点若明若暗或一知半解了。这当然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要紧的是，普氏的某些理论，如他与列宁的不少争论（如他所忧虑的“亚细亚复辟”等），似乎被一层历史的迷雾遮盖着，需要拨开迷雾，重新认识。^③

由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两例，还使我联想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那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倘不分前后（如不分早年的与晚年的）、不加分析

① 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和1972年第二版的《列宁选集》第3卷中均翻译为，“他的那些著作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财富”（1960年版，675页；1972年版，653页）。我们注意到1985年版的《列宁全集》第35卷中没有“可靠的”一词。在这里，引文虽然依据新版的译法，但俄文原文是否有“可靠的”这一意思，待考。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③ 例如，1906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论争，以及随后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些思考，都与列宁论见相悖。此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普列汉诺夫关于“亚细亚复辟”的忧虑果真是杞人忧天吗？对此，参见启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讨论的回顾与思考》，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4期。另，近又翻阅普列汉诺夫的名作《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不仅就如何估计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如何发挥个人作用，普氏作出了精彩的阐述，捍卫与张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而且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其出色的文体与语言风格也令人称羨。

(如不分政治的与学术的),一刀切下去,不作实事求是与历史主义的分析,焉能不错?在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行程中,倘用这种态度对待诸如考茨基那样既背上“叛徒”恶名又负有“史家”身份的历史人物,那么就很有可能错失或遗漏很多有用的东西,而有益于我们的传承大业。

其二,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需要回顾与总结。

回顾意味着过去与将来的对接,总结意味着正确与错误的区分,回顾与总结是反思重建,是学术积累与学术研究工作互相影响的提高过程。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也需要如此。我这里仅以20世纪苏联史学的兴衰得失作一说明。

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中,苏联史学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国际史学界曾拥有过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世界现代史学尤其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①。如今,苏联这个国家虽已解体,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份遗产,并不为之消失,对我们来说,系统地梳理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史学,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正如刘家所和所说,“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经验教训,都是一笔宝贵的极有价值的理论遗产。”^②

因此,为了回顾与总结,这里截取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中的若干断面,略见这种前行中的坎坷,发展中的磨难。

断面之一:一桩冤案。

这里所说的“一桩冤案”,指的是波克罗夫斯基冤案及其平反昭雪^③。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年),苏联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笔耕不辍,著述甚丰,其中《俄国历史概要》曾得到列宁的赞许。事实上,苏联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波克罗夫斯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当然,在他的史学理论中也有不少错误和缺陷。早在

① 张广智:《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现代回响》,《社会科学》(沪版),2003年第12期。

② 见陈启能、于沛、黄立弗:《苏联史学理论》,《专家推荐意见书》(一,刘家所和),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回顾与总结苏联史学和史学遗产是一个值得重视而又颇具难度的学术课题,日前出版的陈启能等三人合著的这本专著,和陈启能等多人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还只是起步,仍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完成。

③ 陈启能:《三十年代苏联对波克罗夫斯基的批判》,载《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

20 世纪 30 年代，波克罗夫斯基及其学派的学术观点受到了最严厉的批判，最后由思想批判发展为政治斗争，波克罗夫斯基俨然成了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使不少历史学家遭到了灭顶之灾。直到 1961 年，苏共 22 大才为波克罗夫斯基恢复了名誉，推翻了当年加在他身上的一些不实之词。

波克罗夫斯基的冤案，令后人生发出许多感慨：能用扣政治帽子、无限上纲上线的非学术手段解决学术问题吗？在这种不正常的批判中，那种用教条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方法解释马克思主义，更不知桎梏了多少有创造性的历史学家的智慧，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也不知伤害了多少有良知的历史学家的心灵。从这一绵延将近 30 年之久的事件中，我们觉察到，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前进的同时，曾付出过多么沉重的代价。

断面之二：在“解冻”的冰层下面。

1956 年，苏共 20 大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首先在文学领域出现了“解冻”。在史学界，也开始清理与消除个人崇拜及教条主义的影响，其高潮是 1962 年 12 月举行的全苏历史学家会议。“拨乱反正”的清风，曾一度激活埋在冰层下的细流。不是吗？如历史方法论^①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曾出现研究热潮，又如比较研究方法、计量研究方法等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总体上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还鲜有突破。实际情况是，苏联历史学家即使在“解冻”时期，仍在苦苦求索，更不必说在斯大林高压政策时代下的历史学的境遇了。

须知，包括史学文化在内的精神文化的发展、繁荣，需要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但是，在它那里老是阴晴不定，冷暖失常，更兼几番疾风骤雨，摧落花枝凋零，遑论于风雨憔悴中煮字烹文。多年来，苏联历史学家正是在这种“阴晴不定，冷暖失常”的学术环境中，备受折磨，努力地寻求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自身价值与自身地位，痛苦地挣扎，坎坎坷地前行。这种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记取的。

断面之三：“历史热”。

苏联史学中出现的“历史热”，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在戈氏改革“新思维”的推动下，“重写历史”与“填补空白点”的舆论，由上而下，由于媒体的渲染，扩之社会，延及全民，日见张扬，至 1989 年

^① 在苏联史学中，所谓“历史方法论”，其内涵与外延较为宽泛，常与历史认识论有重复，甚至还包括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如 E. M. 茹科夫著的《历史方法论大纲》（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中文版）就有一半以上谈论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